

陳寅恪之史學

李玉梅著

留

蜚聲海內外，被譽為「邦國之寶」、「一代通儒」的國學大師陳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以其學識不凡，睥睨群峰的學術貢獻，弘揚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同時，其剛正不阿的嶙峋風骨，亦素為世人所欽仰。其人其學，如同屹立在近代中國學術峰巒的禁柯巨幹，不啻是中國學術界的理性象徵。本書對這一現代學人的家世、經歷、思想、勾勒詳盡，尤其是對其史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觀點、方法、影響，成就都作了詳暢無比、條分縷析的闡述，特別在材料的佔有上，作者用力至勤，除廣泛蒐集相關文字外，還走訪了寅恪後人、弟子。故本書極富文獻價值，被史家評為是「有關寅恪先生之小型辭典」（周一良語）。「是迄今材料收集最詳盡之著述，是今後研究該課題的重要依據」（胡守為語）。在當今以發揚中華優秀文化應乎潮流之事業中，本書堪稱不可多得之作。

陳寅恪之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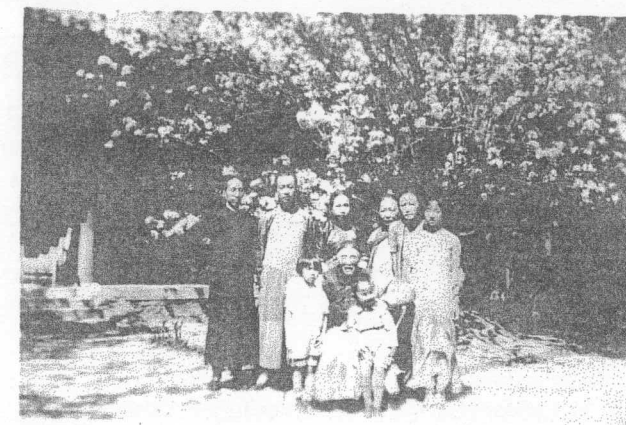
李玉梅著

陳寅恪之史學

季夏林

封面題字：季羨林

責任編輯：胡 瑩 虞 璞



書 名 陳寅恪之史學
著 者 李玉梅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97年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 x 203 mm）680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1370 · 9
© 1997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陳寅恪及家人（三十年代中春夏間於北平）

前排左起寅恪女小彭，父散原老人，俞方濟，即俞大維次子；後排左起寅恪，五兄隆恪，隆恪妻，長兄衡恪妻，九妹新午，即俞大維夫人，隆恪女小從。



陳寅恪暨夫人像



作者簡介

李玉梅，廣東博羅人，香港出生。香港大學中文系一級榮譽畢業後相繼修完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研究範圍以思想史、史學史為主。文章發表於《明史研究專刊》、《澳門中國哲學會論文集》、《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哲學史》（季刊）、《學術研究》、《江漢論壇》、《〈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陳白沙新論》、《語言與傳意》等。曾任教澳門大學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現任職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目 錄

序 一	周一良 1
序 二	胡守為 3
前 言	5
第一章 陳寅恪的生平（一八九〇～一九六九）	1
註釋	6
第二章 陳寅恪的思想	20
第一節 宏揚民族主體精神	20
註釋	64
第二節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92
註釋	106
第三章 兼攝中西的史法	121
第一節 史料處理	121
（一）善用文本	121
註釋	132
（二）考據多方	143
註釋	154

第二節 詩文證史	162
註釋	193
第三節 輔助學科	223
(一) 敦煌遺書	224
註釋	232
(二) 域外語文	244
註釋	267
第四章 自成系統的文化史觀	283
第一節 “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	285
(一) 關隴集團說	285
註釋	296
(二) 河朔胡化說	322
註釋	328
第二節 “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	333
(一) 六朝時期的天師道	334
註釋	345
(二) 隋唐時期的佛教	351
註釋	363
第三節 “社會制度乃文化所託”	369
(一) 隋唐制度三源說	369
註釋	387
(二) 科舉制度下的牛李黨爭	403
註釋	414
小 結	427

附 錄:

有關史家陳寅恪 (1890~1969) 的新材料	432
陳寅恪作品目錄	452
參考目錄	471
古籍部分	471
中文部分	473
日文部分	643
英文部分	644

序 一

周一良

義寧陳寅恪先生一代大師，舉世宗仰。竊以爲其爲人爲學，約而言之，蓋有三端，曰：史家學識，儒生思想，詩人氣質也。

李玉梅博士此書專論寅恪先生之史學。首述生平及思想，次及史學，分兩部分：一、兼攝中西的史法，二、自成系統的文化史觀。史法從三方面闡述：史料處理，詩文證史，輔助學科。史觀則標舉三義：“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社會制度乃文化所託”。寅恪先生史學之犖犖大端，蓋皆包舉於斯矣。

此書最大特點亦最大優點，爲窮盡材料，其表現則在繁富之腳註。敘述生平及思想兩章，舉凡海內外各方人士之回憶及紀念專文，以及寅恪先生遺聞佚事之散見於諸家著述者，無不一一爬梳摘剔，加以徵引。其論史學兩章，則中外學人中贊同或反對寅恪先生論點者，悉皆搜羅排比，以供參證。易言之，此書頗似有關寅恪先生之小型辭典，今後治義寧之學者當皆有取於斯。惟作者廣搜博採而矜慎有餘，吝於論斷。如叙晚年詩文，以“詩無達詁”爲由，於諸家爭論不加斷語，讀此書者定感不足耳。然此書主旨在闡述義寧之史學，作者或以爲晚年詩文之疏解與主體無關，遂珍惜筆墨耶？

抑又有進者，義寧之學博大精深，浩無涯涘矣，其探迹索隱，

鉤深致遠之收穫精湛絕倫矣，豈無一以貫之之精髓，類乎畫龍之睛、探驪之珠者歟？一良不自量，妄加概括，竊以爲即對立統一之規律，即一分爲二、合二而一之辯證觀點方法也。先生善於從紛紜錯雜現象中條分縷析，尋出主次，如論隋唐制度之幾種淵源是也。更善於從表面無牽連之各種現象之間，偵得聯繫或因果，以說明問題。如唐代中央政局與邊境少數民族之間，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桃花源與堡塢之間等等皆是也。先生考史每從小處着手，而實從大處着眼。苟對比其論著題目之窄小範圍與內容引申推論之廣泛，具見因小見大之旨。如四百字小文從無潤神一詞推斷東漢佛教信仰傳入宮中，如考武惠妃之卒年，乃爲論證楊玉環與壽王合卺及入宮年份，而考訂此兩事之終極目的，則又爲說明李唐王室不講禮法之大關目，此皆由小以見大之例之尤著者也。先生論史喜談通則與個別，區別共性與個性。辨析《起信論》智顗序爲僞作，而指出其中卻包含真史料。凡此種種，莫不與辯證觀點方法若合符節也。先生之以詩證史，以敦煌新材料印證舊知識，以至論詩有古典今典之說，謂詩必具兩重意義，亦莫不含有辯證精神也。故曰：辯證法乃義寧學術之精髓。

以上妄作推論，是否堪備一說，尙希玉梅博士及並世賢哲服膺義寧之學者進而教之。

是爲序。

1994年3月21日周一良

寫於北京大學燕東園時年八十又二

序 二

胡守為

近年來研究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不少，有以其生平作綜論，有就其學術內容進行探討，有因其學術方法多方面總結，幾可以成一專門學問。寅恪先生博大精深，德行高尚，中外學者交口稱譽，後學者所尊崇，成爲史學研究的熱點，實理所當然。李玉梅博士以《陳寅恪之史學》爲題，寫成專著，行將付梓，必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寅恪先生認爲“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至於史學的變遷，他在1935年所作《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特別提到：“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今日史學之真諦。”誠如所說，我國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思潮大量傳入，學術界因之發生激變，曾於學術界盛極一時的乾嘉樸學，已受到非議，乃有表面上復古而以古代經典賦予新解釋的所謂“國粹主義”的出現。當時“全盤西化”驚人之論雖尚未流行，但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在社會上則頗有影響。可見西方思潮中無論自然科學方面或社會科學方面，學者中已感到確有其先進可取之處。學術思潮的激變，至廿世紀因馬克思主義在我國

的傳播而更趨激烈。在此思潮激蕩之時，學者固可根據自身的體會與追求，決定其取捨，從總的說來，我國學術界此時“咸有顯著的變遷”應無疑。在此背景條件下，學林傑出之士輩出，便可理解。而寅恪先生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人物之一，故研究寅恪先生的學術思想，不可忽視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他的學術成就也應是我國近世學術顯著變遷的結果。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他在世界思潮激蕩時期的主張和態度，接着他表明“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學者往往以之作爲評論寅恪先生思想的準繩，竊以爲這三句話應是他上引的主張在其身上的體現。

寅恪先生爲我國學術界開一代之風氣，繼往開來的代表者，學者對他的研究逐步深入，這不但有益於中華文化的弘揚，且對今後學術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啟示。李玉梅博士於學術界對寅恪先生的研究已有衆多成果的情況下，仍孜孜不倦，搜羅所有有關文獻，又不遠千里造訪寅恪先生弟子及有關人士，窮數年功夫，寫成《陳寅恪之史學》，對寅恪先生的思想、史法、史觀等方面，力求作全面、準確的論述，其中不乏新識，應是此熱點研究的新貢獻。僅藉此略申對寅恪先生研究的一點淺識，並對李玉梅博士大作的出版表示祝賀和敬意。

前 言

陳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可說是近世最具爭議性的中國史家。從其治學到爲人，在在使人矚目。其治學範圍之廣，創見之多，皆爲罕見；無論是被援引或被批判，不少書種，特別是中古史一段，寅恪的著作，幾乎是必列的參考書。其爲人的半生悲苦，終老堅持，更是一個勝向險中求的道德奇蹟。

然而，陳寅恪的蜚聲國際，甚至是蜚聲於此刻的海峽兩岸，卻是個毋容爭議的事實。從浦立本（Edward G. Pulleyblank）稱其《安祿山之亂》（*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是受到寅恪啟示而作外，陳觀勝論中國佛教亦多採寅恪之見（Kenneth, Kuan-shêng Ché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稱他有“百科全書”式的博瞻與通達 [“Nécrologie: Tchen Yin-kó, (1890～1969)” *T'oung Pao* Vol. 57, 1971]。崔維澤（Denis Twitchett）按寅恪《兩稿》之觀點而開展出《劍橋中國史隋唐篇》的規模（*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 Tang China, p. 589 - 906, Part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到哈文（Charles Hartman）甚至把所作《論韓愈》一書獻給寅恪，以表示對其啟發之敬意（*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日本方面，雖然樺一雄、石田幹之助、池田溫諸學者俱未聞他們的前輩名學者白鳥庫吉曾請益寅恪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但未聞不代表沒有。一九三三年寅恪有〈復錢稻孫書〉，內容即為答覆白鳥庫吉詢問有關中亞史的問題。（《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所收蔣天樞兩文）他如宮川尚志之論中古宗教，亦見寅恪史觀之影子。

中國大陸為了紀念寅恪逝世二十周年，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在一九八九年分別出版了專書致意。

中山大學歷史系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五至廿八日在該校召開了“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了國內外的學者約一百人參加。會上所宣讀的論文後來即編印成《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共收錄論文超過四十篇。

廣州誠然是寅恪一生最後近二十年的居停之地，但對於“昔年眠食地”的北京，他到底是念念不忘的。寅恪的早年弟子今日仍多雲集京華。所謂“名園北監仍多士”，適此先師逝世二十周年之際，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印了《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以示對一代通儒之仰想。

至於寅恪的百歲冥誕，毛漢光把一九九〇年一月出版的《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聯經）用作紀念；而繼一九八八年夏中山大學舉行過“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後，一九九〇年十月卅一日在清華大學亦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座談會”（雲竺文，《中國文化》第四期，頁二〇〇，一九九一年春季

號）。會上五十多名學者的發言中，部分收入了王永興主編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至三日，中山大學為紀念寅恪最後力作《柳如是別傳》成書三十周年，又舉行了另一次“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題為“《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傳統”。會上宣讀的文章亦已編印成書，〈《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

寅恪著作之結集，是以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陳寅恪先生論集》為最早的版本（一九七一年五月）。是集收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寅恪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者。此後，台灣又出了四種寅恪文集：

（一）《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上下冊（三人行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

（二）《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補編》（九思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此單行本後收入下項（三）。下項（四）之補篇與此不同。

（三）《陳寅恪先生全集》上下冊附補編（九思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四）《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下冊附補篇（里仁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九思版與里仁版所收文章基本相同，惟里仁版欠收佚詩及著述目錄編年。九思版所附遺詩述釋之詩目又與三人行版之遺詩述釋不同。所收文目，三人行版與九思版、里仁版則是上冊同下冊異。版本如此多樣不一，一則當然是寅恪名大，各家爭刊其文；另一方面，實更反映了寅恪文稿之散佚難全。即使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七種〔只有此版本附《柳如是別傳》及寅恪部分詩作。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尚有三種寅恪著作：《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一九八八年），《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一九八九年），《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一九九二年）〕，《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先後兩次印刷所收之篇目亦略見多寡之異。第二次印刷比第一次印刷多收末尾五篇；而《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之〈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及〈寅恪先生詩存〉均屬零星殘稿。近年國內有輯錄兩種，可說是補充之作：

（一）《陳寅恪詩集·附唐寅詩存》，陳流求、陳美延合編，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是書所收寅恪詩作，較《寒柳堂集》之〈寅恪先生詩存〉多出七十首（參閱本書附錄），是目前收錄寅恪詩作最多的版本。

（二）〈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石泉整理，王永興主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頁二六至五〇，江西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

至於香港出版寅恪專書，則以文文出版社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陳寅恪先生文史論集》上卷為最早（今只見上卷）。此外，一九七四年四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亦出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本書所參考之《兩稿》即根據香港版的本子，單篇文章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詩則基本上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的《陳寅恪詩集》，亦及另收寅恪專著中並蔣天樞所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者。順帶一提的是，本書註釋所下頁碼，一般是指正文援引所自，而非指整篇文章所佔之頁數；所引期刊材料之發表期號年月，不憚重複。若後該文結集成書，則除首見

註釋時兼附原載期刊詳情外，餘俱只註後出專書之出版時地頁碼。除附錄一文外，書中直呼寅恪，為方便行文故耳，並無不敬之意，特此說明。）同年九月，香港珠海書院何廣棧先生編有《陳寅恪先生著述目錄編年》（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學會出版，後收九思版《陳寅恪先生全集》而略有增補。稍後，何廣棧先生又編有《陳寅恪先生遺詩述釋》，珠海書院中國文學歷史研究所學會叢刊之七，見收九思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補編》。而香港珠海書院《珠海學報》第三期，即一九七〇年六月本另刊有李光堯〈故陳寅恪教授著作目錄〉），其中〈待考書目〉中，有〈兩晉南北朝史參考資料〉一項。考〈兩晉南北朝史參考資料〉乃寅恪五十年代初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所編之講義材料，多採正史之書，與一九八七年四月萬繩楠所編之《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安徽黃山書社）當可相提並論。

寅恪創見之多，惹來爭議之大，可謂近世以來，無出其右，例子亦甚難遍舉。隨意道來，如唐代氏族與李白等的胡漢問題、唐高祖有否稱臣突厥、唐代府兵的來源與兵力的商榷、關隴集團與牛李黨爭的組合分野是否明晰、安史亂後河朔胡化說能否成立、韓愈是否開宋學之先河、〈長恨歌〉與〈長恨歌傳〉應分抑合、〈長恨歌〉作者白居易的父母是否舅甥亂倫、〈長恨歌〉的主角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平上去入之四聲說究竟是否因受六朝善聲沙門轉讀佛經啟發而生、曹操出身寒門抑或望族等。

以上的爭議項目，除對寅恪論點誤解者不論外（H. J. Wechsler 'Factionalism in Early Táng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áng*, Denis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edit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3), 或有能以考證事實稍勝者，如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中

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五月新一版）、章羣《唐代蕃將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六年三月）及續編（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〇年九月）。惟寅恪治史，本不側重事物物的考證，是故以考證事實稍勝者，雖自有所見，亦無損寅恪自成體系的史觀。李白是否真胡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李白足以代表中國文化，是寅恪意欲說明文化比種族來得重要。唐高祖有否稱臣突厥姑且不論，寅恪寄望中國能獨立於蘇聯之外，鼓勵統治者“初雖效之，終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傑之所爲也”，是寅恪“民族主體精神”之見解。安史亂後河朔胡化不在乎胡人數量的寡少，亦不在乎是否仍有人在唸孔孟之書（方積六《唐代河朔三鎮“胡化”說辨析》，《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胡人數量的寡少，但其居於統治之地位，一如居住於殖民地之宗主國國民，人數肯定不比本地人多，但影響力無疑卻是最大。此時此地即使仍有人唸孔孟之書，亦無補於晉身之難，蓋晉身之階，在武不在文，是此亦一胡化現象也。或按河朔胡化說進一步分析，以鎮州暨沱河爲一社會及文化線，在此以北，其人武質極濃，儒學甚淡；在此以南，其文化水準及文風當然不及兩京及江東，但肯定不能目之爲“胡化”（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之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爲例》，《晚唐的社會與文化》，學生書局，一九九〇年九月）。此說固較平實，但仍屬事物物的考證範圍，自始即沿寅恪研究領域之創見出發者。寅恪河朔胡化論是亦說明其文化大於種族之史觀；而挾着權力而來的文化力量就更無視於種族數量之多寡矣。至以“階級成分”論歷史人物，寅恪亦嘗及之，惟“此亦一階級，彼亦一階級”耳。寅恪以爲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一爲內廷閹宦，一爲外廷士大夫；而閹宦之出身爲非儒家之寒族如曹操之類。今以亳縣發現曹氏宗族墓

羣，印證漢末譙縣曹氏宗族田莊狀況，而謂曹操實望族也（萬繩楠〈廓清曹操少年時代的迷霧〉，《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是純從經濟角度定階級。寅恪定曹操爲寒族，卻是從文化標準落墨：

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

後人遂有注意閹宦出身之研究，意亦由此而起（金應熙〈略論東漢之宦官〉，《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唐長孺〈唐代宦官籍貫與南口進獻〉，《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要之，凡寅恪言所謂“階級”者，莫不就文化爲依歸（胡守爲〈李義山無題詩試釋評語讀後〉，《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一輯，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是亦貫徹其文化史觀之意也。後世或謂寅恪治史有不自覺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其實寅恪治史自有其成一家言之體系在，亦非不知世有馬列之義，唯是不必以合乎馬列方爲正確耳。其所持文化高於種族之史觀，強調宗教與政治不能無所關涉，制度實文化之所託等，又非僅是中古史之範圍，實屬歷史永恆之主題矣，此其所重視者，不在一事一物之考證故也。正如季羨林云：

寅恪先生繼承了清代樸學考證的傳統，但並沒有爲考證所囿。考證學者往往不談義理，換一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不大喜歡探索規律。但是，寅恪先生卻最注意探索規律，並不就事論事。他關於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爲證。他間或也發一些推崇宋學的議論，原因大概就在這裏。（《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序》）

至論寅恪史觀，種族與文化並提而認為文化之關係較重、種族之關係較輕（《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一七）。論者稱這種看法，實受德國浪漫時期史家如赫德（J. Herder）之影響（劉健明〈論陳寅恪先生的比較方法〉，《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無論如何，寅恪史觀所揭主題之永恆性，曾不止一次使後人亦步亦趨，至今未已。相沿之路子既極，遂有登高一呼聲稱要另闢蹊徑者（龔鵬程〈論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晚唐的社會與文化》），亦不過是反映寅恪史觀影響之深遠吧了。

寅恪總結王國維之三目治學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論者或以此三目乃寅恪夫子自道，蓋寅恪從無刻意討論史法之作（如袁英光、蔡鴻生言。季羨林則謂寅恪素不愛理論，以理論常變之故）；亦有論者以為若以三目為準，則寅恪要比觀堂為高，尤以第三目為然。如寅恪史法，頗有借鏡社會學方法者。如河朔胡化說，即屬社會學區域文化的個案研究，並及人口學家“人口變遷”（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論題，從而倡導族譜的史料價值。又社會學家注意各種革命的比較研究，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比較唐代中央革命與地方革命之成敗因由（雖則寅恪所謂“革命”一詞有未盡今人定義者），從而道出唐代“關中本位政策”內外輕重之形勢。許倬雲論到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時就指出：“在純粹史學家的陣營中，陳寅恪雖然未曾自己聲明具有社會學的觀點，他對南北朝史，隋唐史的許多單篇著作，或以民族羣的混合、衝突與協調為課題，或以社會階層中的變動為著眼體。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更揭出中國中古門閥的大題目，把牛李黨爭

歸結為世家子弟與新進士的鬥爭……”（〈社會學與史學〉，《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人文科學之部，史學，正中書局，一九六六年。劉健明亦有類似說法。詳氏著〈論陳寅恪先生的比較方法〉，《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二三六。）

寅恪史法，固然多方，惟當以詩文證史最為突出，雖非創法之人，卻是用之最見成就者。按寅恪詩文證史誠屬考據，卻又不止於考據，是故本書闢“詩文證史”為獨立一目，不入考據。寅恪晚年力作《柳如是別傳》，即欲自驗詩文證史法深淺之著也：

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史道藏，寅恪平生才識學問固遠不逮昔賢，而研究領域，則有約略近似之處。（《柳如是別傳》首章）

寅恪詩文證史之際：

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

真可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琵琶引》《元白詩箋證稿》）

寅恪素重的此種古典今情之兩重意義，論者以為實與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有異曲同工之妙〔余英時〈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明報月刊》，一九八四年十、十一月號，後收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又收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何新〈陳寅恪學術思想散論〉，原題為〈樸學家的理性與悲沉：讀《陳寅恪文集》論陳寅恪〉，《讀書》，一九八六年五月，後改今題收氏著三種（詳參考目錄）。姜伯勳〈唐令舞考——兼論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的文化闡釋〉，《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故說詩文證史雖非創自寅恪，解釋學之運用卻不得不列為寅恪治學之“預流”之一（寅恪所謂

“預流”，即指世界學術之新潮流。〈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寅恪早年留學歐美，其史法參考西方而絕不露絲毫斧鑿痕迹，實已見其主張中國化而以宏揚民族主體精神為重心之思想矣。

寅恪既嘗以“熱中怯懦”之牧齋相比（《柳如是別傳》下冊，頁八三五），復取牧齋之志為志：

居恆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為我代下注腳。發皇心

曲，以俟百世。（《柳如是別傳》首章）

配合其早年“能所雙亡，主賓俱化”之論，其晚年如墮文字獄網之生活環境，後世遂有人奮臂而作“明眼人”者，余英時是也。惟詩無達詁，此所以余英時、汪榮祖、馮衣北（劉斯奮）、高陽（許晏駢）、梁錫華（梁佳蘿）諸君子所論亦有“仁者”、“智者”之不同。

觀乎以上無論對寅恪其學其人之無數研究，宜乎近年有“陳學”一詞之出現矣（季羨林序，《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頁二五。）

本書第三章第二節曾略作增刪而以〈詩文證史與解釋學——陳寅恪史法淺論之一〉為題在澳門一九九一年中西哲學研討會上宣讀。第二章第一節則亦略作增刪以〈宏揚民族主體精神——陳寅恪思想淺論之一〉為題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四川德陽“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附錄則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十四屆亞洲及北非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的〈有關史家陳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的新材料〉一文的節錄。

本書撰寫期間，寅恪弟子金應熙教授從旁指引；又及走訪寅恪後人及弟子，於此或帶點口述歷史的精神。其中尤以金師意最殷切。不料書稿初成，金師不幸遽然病逝香港。時為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謹記於此，以紓遙念。

第一章 陳寅恪的生平

（一八九〇～一九六九）

民國以來，堪稱大儒者，有“教授之教授”^[1]之稱的陳寅恪，想必當之無愧。這位成名甚早^[2]的“道地的學院型人物”^[3]卻是一生坎坷，誠如他自己所言：“生為帝國之民，死作共產之鬼”^[4]，真可說是與中國近世的動亂與苦難相終始^[5]。

陳寅恪，原籍江西修水（舊義寧州）^[6]，出身“烏衣世家”^[7]。曾祖偉琳，“以能醫名”^[8]，且“懷經世大志”^[9]；家學所及，即研文史如寅恪，亦間以其醫學常識討論問題^[10]；至於其祖寶箴（一八三一～一九〇〇）治事之幹練，屢應時變所當為^[11]，就更能光大其父偉琳之胸懷壯志矣。

寶箴有子女各二人，長子三立即寅恪之父。陳三立（一八五四～一九三七），字伯嚴，別號散原^[12]，與宋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同屬鄉里。而散原之出，亦昌大了以黃庭堅為開山祖師之“江西詩派”，八百年前後輝映，可說是一時佳話^[13]。

三立有子五人，女三人，除長子衡恪（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外，俱為繼室俞明詩所出^[14]，計有隆恪（一八八八～一九五六）、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方恪（一八九一～一九六四），登恪（一八九七～一九七四），女康晦（適張宗義）、新午（適俞大維）、

忱余（適薛琛錫）^[15]。兄弟各人，唯方恪未留學^[16]。長兄衡恪，即民初鼎鼎大名的文人畫家陳師曾^[17]，他與齊白石一段交情，足見衡恪藝識之高^[18]。五兄隆恪，活躍財經界，但家學所至，亦有《同照閣詩鈔未刊稿》^[19]。七弟方恪，擅長目錄學及詩詞^[20]，並時代散原應酬詩作，有《鸞坡草堂詩詞》。幼弟登恪，曾化名陳春隨出版《留西外史》一書，一九四九年後任教武漢大學^[21]。總之，陳氏一門多傑，的是“文化之貴族”^[22]，而寅恪尤屬陳家白眉，世所公認為近代學人中最淵博的一位^[23]。

一八九〇年七月四日（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十七日），寅恪生於湖南長沙中唐劉蛻故宅。因生於寅年（虎年），祖母黃氏名之曰寅恪。祖父寶箴擬以“鶴壽”為寅恪字，但此字未曾使用^[24]，知者亦不多。寅恪幼年隨父母兄長曾先後居留湖北武昌、湖南長沙、江西南昌、江蘇南京等地，習學家塾。惟家風開明，吸收知識，兼重中西^[25]，遂以十三歲（一九〇二）之年，隨長兄衡恪東渡日本，直至三十六歲（一九二五）自德返國。寅恪放洋求學，前後凡二十三年。除去中間多次回國逗留之時間，在國外實際唸書的時間，亦有十三、四年之久^[26]。遊學國家包括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留歐階段，寅恪的研究主要是西歐各國的語言和文學。一九一八年冬，因得江西省教育廳官費，遂至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希臘文、巴利文等中亞、南亞古代文字兩三年^[27]。一九二一年，離美重赴德，進柏林大學研究院，繼續習東方古文字學四年^[28]，這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官費停寄，寅恪在德不獨生計無落，且因長期營養不良，終至大病^[29]。適北京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聘寅恪為導師^[30]，遂於一九二五年歸國休養兼侍病父，翌年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職^[31]，開始他四年的研究院導師生

涯^[32]。一九二七年夏，研究院導師之一的王國維（一八七六～一九二七）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寅恪與之“交”“言”俱深，既作〈輓王靜安先生〉七律一首以輓^[33]，復為長歌當哭，有〈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34]，後二年，更為“王靜安先生紀念碑”，成刻石之辭^[35]。其中輓詞並序，尤屬悼念王國維諸篇中之最佳作品^[36]。其實，以意逆志，言為心聲；寅恪維護觀堂，無非夫子自道^[37]。於寅恪衆作中特標出此，因關係寅恪思想甚大之故^[38]。一九三一年，寅恪任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合聘教授，並為兩系的研究所開專題課。在中文系和研究所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等；在歷史系則開“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等課^[39]。從研究院導師至大學教授，寅恪任職清華，約共十年^[40]。一九三九年，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導師^[41]。其間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等職^[42]。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寅恪八十五歲老父不勝憂憤，絕食而死。論者謂寅恪眼疾，正因是次哭父而得^[43]。不過，戰時顛沛之生活，亦有以致之；所謂“流轉西南，致喪兩目”^[44]。父喪事畢，寅恪一家，倉皇逃離北平，歷盡艱辛，終隨清華遷至長沙^[45]。是年底由於戰火逼近，原由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合組之臨時大學決定翌年春再遷昆明。寅恪時眼疾漸劇，南下赴滇。途經香港，幸得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幫忙照拂寅恪家小^[46]，寅恪始能隻身取道安南去雲南蒙自，到當時由三間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授課，時為一九三八年春。一九四〇年春，寅恪以中央研究院理事身分，出席在重慶舉行的中研院會議，並有詩記其事^[47]。寅恪詩中所感，對於了解寅恪日後的去留問題，不無幫助。

由於陳夫人仍臥病香港，寅恪於一九四〇年夏再臨香港，並待

赴英國牛津大學時機。值歐戰起，未能成行，遂應香港大學之聘，為客座教授^[48]。以後在許地山逝世後接任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之職^[49]。在香港大學所開專題，主要是章莊的“秦婦吟”^[50]、“魏晉南北朝史”、“唐史”等。當是時公開演講英文的有“武則天與佛教”^[51]、中文的有“秦婦吟”、“會真記”等^[52]。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離港大^[53]，並謝絕任何淪陷區內的聘請^[54]甚至好處^[55]，閒來只讀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自遣^[56]。一九四二年五月，寅恪不得已，唯有扮作塾師，乘漁船逃離香港^[57]，六月底抵桂林^[58]。

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寅恪自香港抵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約有年餘，並辭去中研院之職^[59]。一九四三年夏，長沙吃緊，寅恪輾轉至渝^[60]。同年冬，抵成都，任教燕京大學。用他唯一僅留的左眼，繼續從事學術研究^[61]。一九四五年春，左眼亦告失明^[62]。天喪斯文，惟有書恨：

天其廢我是耶非，嘆息甚弘強欲違。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託任寒飢。西浮瀛海言空許，北望幽燕骨待歸。彈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霑衣。^[63]

復有三絕，不絕其悲：

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

鬼鄉人世兩傷情，萬古書蟲有嘆聲。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

女癡妻病自堪憐，況更流離歷歲年。願得時清目復朗，扶攜同泛峽江船。^[64]

一九四五年夏天，抗戰勝利。英國牛津大學仍虛位以待^[65]。寅

恪“眼暗猶思得復明，強扶衰病始飛行”^[66]。可惜成都庸醫固然手術不佳，目疾依然^[67]；英美名醫，亦俱無良策^[68]，惟有失望回國，在南京稍作勾留，於一九四六年十月重抵北京清華園^[69]。誰知內戰日迫，一九四八年年底，中研院院長傅斯年電請寅恪飛南京。到南京翌日，即轉車至上海^[70]，並決定應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聘^[71]，仍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72]。

一九五一年，寅恪改為任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翌年九月，由於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名義取消，原中山大學遷入嶺南大學校舍，稱中山大學^[73]。一九五四年，完成“傳播中外，議論紛紜”之〈論再生緣〉^[74]，並婉拒出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而薦陳垣代己^[75]。一九五六年，中國副總理陳毅夫婦到粵，特訪寅恪^[76]。翌年，新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關照有關人員在陳宅院子裏特修一條白色甬道，慎防寅恪散步時會摔倒^[77]。陶鑄又因知寅恪素喜聽戲，特送來一架優質收音機^[78]。一九六二年秋，寅恪不慎跌斷右腿，住院半年多，此後一直不曾下樓^[79]。一九六四年夏，經營十年之“錢柳因緣詩證釋稿”初成，後易名為《柳如是別傳》，文凡八十五萬，分三冊出版^[80]。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廣州“文化大革命”開始，協助寅恪著書工作十四年的黃萱被紅衛兵趕走^[81]，公家所派護士三人亦不得留。大字報貼到床頭、門上，寅恪心臟病開始惡化^[82]。至是抄家無數^[83]，稿件^[84]、財物^[85]損失不可計。紅衛兵甚至要把寅恪抬到禮堂批鬥，猶幸寅恪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學生、前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86]挺身而出，代表寅恪挨批鬥^[87]。但“交代”是不可少的，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去世，陳夫人一共代寅恪寫“檢查交代”七次、“聲明”一次、“口頭交代”兩次^[88]。由於工資存款俱被凍結，